

儒家人格美理想与梁漱溟的“君子”形象

李启军

提 要 儒家人格美理想即是“君子”,其人格美内涵主要是“浩然之气”、“勤于思”而“敏于行”与“尽名分”、“反躬自省”等方面,本文相应地从三个方面分析现代大儒梁漱溟与儒家人格美理想的对应性,从而确证梁漱溟正是儒家所谓的“君子”,其言其行体现的正是君子风范。

关键词 儒家人格美理想 君子 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自以为算不得一个纯粹的儒家,而是亦儒亦佛的,有时甚至干脆说自己是佛家。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承认儒家也是他的思想的一个“根本”。他曾对美国学者艾恺(Guy S. Alitto)表白说自己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跟佛家。而且,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序言还说过“这书的思想差不多是归宗儒家”。^①在梁漱溟看来,儒佛不同但相通,在他自己身上,则主要是以儒家精神济世,以佛家精神安身。梁漱溟对待荣辱、顺逆的人生境遇是一个佛家,但在对待文化传统、社稷民生上却是一个儒家,当然又是一个新儒家。美国当代传记作家艾恺称其为“最后的儒家”,并非溢美之词。我们相信,通过下文的层层剖析,我们将看到一个现代儒家的“君子”形象。

一 在“权力”面前说“不”与“浩然之气”

世界著名文化理论家托尼·本尼特教授(澳大利亚学者)在《文化:改革者的科学》中,运用福科关于文化与政府关系的理论考察当代知识分子与政府间的各种关系,指出政府的作用以各种方式——或直接、或明显或隐晦而无所不在地渗透到知识文化领域,因而当代知识分子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地依附着政府。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自主性与反抗性虽然可视作知识分子的目标和理想,但很难成为知识分子的现实真实。

应该说托尼·本尼特教授指出的是事实。但是,就是在独立性、自主性与反抗性对于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来说都已退缩为虚幻的目标和理想的时代,梁漱溟却硬是不屈服于权力,执着于自己的思想而特立独行,敢于在权力面前响亮地说“不”。而面对当代知识分子普遍地失落独立性、自主性与反抗性的世界性问题,真正的知识分子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而海德格尔式地自问:知识分子何为?正是在对使命的深沉追问中,敢在“权力”面前说“不”的大儒梁漱溟的形象,浮雕般地凸现了出来。

^① 梁漱溟:《唯识述义·初版序言》,见《梁漱溟全集》卷1,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1920 年代初期,在陈独秀、胡适等学界名流倡导下,“全盘西化”的声浪此起彼伏,梁漱溟却主张“调和中西”。1927 年蒋介石慕名相邀,托人请梁漱溟去武汉,他却说与蒋没什么相干,不去见他!1938 年梁漱溟初赴延安就和毛泽东发生了思想交锋,在如何看待老中国的问题上两人争了起来,毛说梁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梁则说毛对中国社会特殊性认识不足。1949 年,新中国诞生在即,梁漱溟却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敬告中国共产党》的文章。1953 年,梁漱溟竟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与毛泽东顶撞起来,毛说梁反对总路线,梁说自己没有反对总路线,还要看看毛有没有公开承认自己误解了他而作自我批评的雅量。到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梁漱溟却只字不提阶级斗争,而认真宣传他的“科学之事”和“道德之事”两大道理。看到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了,他就反讽说即使他们有九十九个功,因为有了反党这一过,便以反党这一大过抹掉了过去长年以来的九十九个功。1970 年四届人大召开前讨论《宪法草案》,梁漱溟忍不住又发表“怪论”说宪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限制王权,所以反对把个人的名字包括定林彪为接班人写进宪法。1973 年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却坚持只批林不批孔,就是批林他也与众不同,别人都说批判林彪的政治路线,他却却是批判林彪的做人,说林彪的主张是不能公开的、见不得人的,因而无路线可言。1978 年春天,政治的气候还是“乍暖还寒”的时候,梁漱溟却率先公开在大会上说毛泽东搞的主要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后来全盘西化的“自由化”思想泛滥成灾的时候,梁漱溟却发起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大讲世界未来的前途必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在当权者面前不畏惧,是在“权力”面前说“不”;在国家政府意志面前敢于保留自己的真诚的“不理解”,也是在“权力”面前说“不”;在主流意识形态面前以审视者姿态发出新异的声音,也是在“权力”面前说“不”;在时髦思想或思潮面前保持独立思考甚至逆潮流而动,仍旧是在“权力”面前说“不”。一个独立、自主的真正知识分子梁漱溟就是这样敢于在种种“权力”面前响亮地说“不”。

敢于在“权力”面前说“不”,体现的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梁漱溟何以有如此“浩然之气”,因为他心中“无我”,没有私心,不为私利,只为国家、只为百姓,仗义执言,心安理得,即所谓“心正”“意诚”。他曾说:“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做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我凄凄惶惶究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①儒家讲人格修养特别重视“心正”“意诚”。《中庸》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大学》说“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诚于中,形于外”。意诚心正,心胸自然就坦荡,即孔子所说“君子坦荡荡”,也就无所顾虑、无所畏惧了。《论语·颜渊》说“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1953 年 9 月中旬,中共中央向民主人士征求对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意见时,梁漱溟敢公然说出“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的话,那是因为他觉得他基本没有歪曲事实,而是尊重事实的,而且,他并不是要否定总路线,只是真诚希望共产党真正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从而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拥护。他是善意的,也是

^① 梁漱溟:《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见《我生有涯愿无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6 页。

真诚的。也正因为如此,毕竟是了解他的毛泽东虽然当时很生气但最终是给他定性为“思想问题”而非“政治问题”。这或许可以证明毛泽东在内心也是佩服他的“浩然正气”的。

二 本己思想而动与“勤于思”而“敏于行”

梁漱溟是一个本己思想而动的人,是一个从思想者的高度对种种“权力”说“不”的。

所谓从一个思想者的高度对权力说“不”,就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说“不”时不是赖皮狗的耍赖,不是嬉皮士的不负责任,也不是泼妇骂街的粗鄙,也不是莽汉闹事的凶蛮,而是实事求是的论证,丝丝入扣的追问,平等平静的说理,深思熟虑的见解。梁漱溟对自己有一个评价:

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问起:梁某究是怎样一个人?便为我回答说:

“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或说:

“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这样便是恰如其分,最好不过。如其说:

“他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社会改造运动者。”

那便是十分恭维了。^①

我很欣赏他的这个自我评价,因为从他不断在“权力”面前说“不”的执着精神来看,他的确是一个有思想且本着其思想而行动的人。《孟子·尽心上》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昏昏然生活的人大有人在,而梁漱溟却能做到“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都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用自己的脑袋去想,都能始终不渝地持守自己的思想,任何强大的外力也无法动摇其立场。有自己的思想,执着于自己的思想,并且本着自己的思想而行动,这就是大儒梁漱溟。

表面看起来,梁漱溟公然和“权力”对抗是拿鸡蛋砸石头,是逞匹夫之勇。如果从明哲保身的角度看,以成败来论英雄的话,那么他也许真正是匹夫之勇。但是,如果深究起来,要追究起他在“权力”面前说“不”的“为什么”和“所以然”来,那么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勤于思索,善于思索,视思想为生命的真正知识分子。而“勤于思”是孔儒十分重视的,孔子在《论语》中告诫学生“学而不思则罔”,唐代大文豪韩愈也说“行成于思毁于随”。梁漱溟强调“一切学习都有创造”。这创造从何而来?必然从思索而来。在认识老中国的问题上,他为什么不赞同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方法,因为他经过思考研究,认识到中国从明清到新中国,阶级分化不明显,阶级差别不清楚,阶级成分不固定,虽然存在贫、富、贵、贱的层次,但是上下流转相通,这跟欧洲的社会不同。中国百姓一向奉行“耕读传家”,农家子弟一旦读书学成可以中举、点翰林,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近代虽有了资本主义,但仅是萌芽,远未成熟。这也就是他所看到的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始终强调建设新中国必先认识老中国,认识老中国的特殊性。所以他只能“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而反对共产党“拿外国的办法到中国来用”,也就是怀疑毛泽东

^①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自序》,北京: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阶级斗争”方法的实际有效性,他认为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从中国文化的现实之根农村入手,解决农民问题,首先是教育农民,改造农民的思想意识,使民主制度实施具有坚实的思想基础,所以30年代时他在山东邹平县等地搞过“乡村建设”实验。由于日本入侵,他的实验还未显出明显收效就不得不终止,但现在已引起国内外一些社会改造运动家的注意。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法也已为历史所证明只能埋葬一个旧中国而不能建设一个新中国。基于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社会的特殊性的感受和认识,在他情感和思想的深处始终最关心的便是社会改造以及怎样进行社会改造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安宁、进步与美好。所以,不仅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争论时反对“阶级斗争”方法,在《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又诚恳地对中国共产党说,在好战者不复存在之后“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以至到了高呼“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他仍不愿违背自己的思想去随潮附势地唱阶级斗争的颂歌。他的种种“狂语怪话”在他绝不是随随便便乱说的,而是“三思”之后认认真真说出来的。他何尝不知道这类话说出来是要遭灾惹祸、引火烧身的?但是他的思想给了他虎胆,是他的思想逼迫他说出这些不失“童心”的话的。

他之所以说工人九天农民九地,是因为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深深地体味和认识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他之所以反对把个人名字写进宪法是因为他认为宪法的作用就在推进民主政治、实现人人平等。他之所以说老干部被一个过抹去了九十九个功,是因为他认为那九十九个功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抹去的,更何况那一过兴许还不成为其过。他之所以只批林不批孔,是因为他认为林彪连人格都没有而孔子是大思想家,岂可相提并论,硬把他们捆绑在一起批判不是既可恨又可笑可怜的荒唐事吗?他之所以不畏政治迫害率先指出毛泽东搞人治不搞法治,是因为他深知中国人民再也经不起人治的折腾了。他之所以在西化之声铺天盖地的时代打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旗帜,是因为他坚信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西方文化所不及的长处。你可以说他太狂妄了,狂妄得忘了自己姓甚名啥了,但那是在他挺身而出维护自己的独得思想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他一无所有,有的只是自己的思想,因此,当他唯一的所有也要被人拿去的时候,他就会象无助的孩子一样死死抱住它不放了。

而在真正的思想面前,他又是那样地谦逊。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始终敬佩毛泽东的思想,说毛泽东才气超拔群哲,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人。他自己被后人尊为“新儒家”、“最后一个儒家”,但是他却诚恳地说:“我对于儒家或佛家都还是门外汉。我只在门口向里面望一望,望见里面很深远广大,内容很丰富。却没有走进门去。……我是个凡夫俗子,一个平常人,对于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庸’,是远远不够谈它的。”^①

梁漱溟深知孔子“敏于行”的思想的重要。在他看来,一种思想再独特、再深刻,如果未能在实践中贯彻、实行,终究不过是“纸上谈兵”,只有将思想落到实践中,转化为实在的实践成果,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所以,虽然他的乡村建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以失败告终。因为当时农民为苛捐杂税所累,而他们不可能马上替农民减轻负担,农民没有土地,而他们不可能把土地分给农民,所以抓不住农民的心。到头来只能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但是,这毕竟是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一次社会改造运动,他希望人们能够认识

^① 梁漱溟:《敬答一切爱护我的朋友,我将这样地参加批孔运动》,见《我生有涯愿无尽》,第286页。

到它的启示意义,所以他希望人们赞赏“他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社会改造运动者。”美国学者艾恺曾经问他“你以为你生活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①可见,他是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思想者的,更希望做一个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思想的行动者,所以又有人称之为“行动的儒者”。^②在上述对话中他特别提到了他的“乡村建设”。那是在1924年,他已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我们知道当时大学教授的薪俸是很高的。但是,他毅然决然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北大教职,接受朋友之请,赴山东开展乡村建设实验。他的乡村建设思想萌芽于1922年,基本成型于1926年,成熟于1928年。1930年“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创建,梁漱溟在那里一干就是整整7年。至于进行乡村建设的意义,他曾回顾说“进行乡村建设工作,我头脑中所设想的有两个要点,因为从我的眼光看,中国有两大缺欠。中国农民的散漫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农民不关心国家,国家也不管农民。农民散漫,缺乏团体组织,这是一个缺陷。中国社会所缺乏的另一面是科学技术。我所想的宪政的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须从团体自治入手,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我梦想的团体自治是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主要是生产合作,也包括消费合作、信用合作。西洋进步从都市入手,是向外侵略发展贸易,而牺牲农村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总之,中国缺乏‘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八个字。将这两方面补进来,中国即发达进步,成为很好的国家。”^③可见,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国家。这是真正的现代大儒的社会理想。

三 知识分子使命与“尽名分”及“反躬自省”

梁漱溟有很强的使命意识,他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一个人要去完成自己的使命,用儒家的话说就是‘尽名分’。儒家思想讲究‘尽名分’。一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利是其‘名’,他在此位置和地位上应担当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则是‘分’。‘名’与‘分’是对应的,有什么样的‘名’就应该尽什么样的‘分’,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甚至常委,就应该尽到与此‘名’相应的‘分’——参政议政、为执政党出谋划策,而且作为毛泽东多年的朋友,更应该真实地说出自己真实的看法,而不应该玩欺骗手段。我们在生活中会发现某些人常常从一己之利出发去说话做事,没有公正的原则,也没有深刻的思想,但却自以为是,容不得不同意见,不懂得在自己的位置上尽名分。忘了自己的‘名’与‘分’不说,还要强迫别人‘同’己,其结果必然是远离了‘和而不同’而沦落为‘同而不和’。梁漱溟却不是这样,他很清楚自己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以致常委的‘名分’,只是去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建言献策,当毛泽东生气发怒了,他不是硬要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必须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决策和行政,他只是想辨白自己并没有反对总路线的动机和意图,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并相信他这一点。虽然他犯了‘躁’而‘瞽’的毛病,但并非‘无理取闹’。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梁漱溟虽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以致常委的“官”了,但他始终

① 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之《附录二:美国学者艾恺访谈录(摘录)》,第367页。

② 《梁漱溟——行动的儒者》,《青年与社会》2007年Z1“特别策划”。

③ 梁漱溟:《我从事乡村工作的简略回顾》,见《我生有涯愿无尽》,第98页。

没有忘记自己作为社会的“感官”和“神经”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永远不停止思想。

梁漱溟之所以视思想为生命,是因为他真正觉悟了自我作为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他深知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身无别的长物,能够贡献给国家、社会、民众的主要就是自己的思想了,所以在他来说身外的物质财富之类较之所拥有的思想是不足挂齿的。红卫兵抄家那阵把他的东西都抄走了,他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措辞感人肺腑,剖露了他视思想与思想的表达如生命的心迹:“此番抄家,一切文稿(已完成的,未完的)全被收去(似有被毁的)。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续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盖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人的生命是为其向上心不可分离的;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以故家中书籍几千全数被收或被毁;钱财百分之百被收去(发还十二元),衣物等等被毁被收者百分之九十八;在我举不足惜。唯求发还我的那些文稿,准许其续写成书,书之出版与否,非所计,甚且限于自己寿命,是否得完成其书亦复难定。但我生活一日,必致力于此工作一日耳。此其心怀,主席其必能谅察之乎!”^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能贡献思想,不去创造精神食粮,生不如死,这正是梁漱溟对自己价值的觉悟。

他是把不断贡献思想和思想的结晶品作为自己人生的使命去奔赴的,所以他才能不论身处怎样的处境、面对怎样的压力,都能尊重自己的思想、坚持自己的思想,而绝不趋炎附势、人云亦云、出卖灵魂。他为了践行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使命,从延安到北京一再表示象他这样的人还是留在政府外面好,他原是民盟的创始者之一,后来看到不需要了便退出来。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但他的本意却是不受政府的牵制而能真正用自己的脑袋自由地思想。后来他虽然勉强进了政府,但他并没有忘了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用自己的脑袋去思想,否则我们今天也就看不到身为大儒的他的种种传奇故事了。当然,当官和知识分子并非水火不容,但如果知识分子一旦当了官就把自己的脑袋悬置起来,习惯于听人发号施令又向人发号施令,那就真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哀了。梁漱溟始终没有抛开思想的使命,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他加上一个“思想到老”。

一个知识分子具有使命意识,能够“尽名分”,才能于社会和国家有所贡献。同时,一个知识分子还需要反躬自省的能力,勇于反思自己的过错,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有错就改,而不文过饰非或推卸责任,才能胜任“理性”的“监管人”。《论语·卫灵公》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孟子·公孙丑下》曰:“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中庸》亦云:“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这是说“在与人相处时,儒家主张反躬自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从改善自身修养上用力,不能怨天尤人。”^②比如,梁漱溟晚年在追忆1953年与毛泽东的那桩公案时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

^① 《致中央文革并转毛主席》,《梁漱溟全集》第8卷,第80页。

^② 罗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目标和问题》,马克·第亚尼主编:《非物质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①他事后能坦率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说明他具有反躬自省的美德。他作为儒学的现代传人,当然是知道“不傲”、“不隐”、“不瞽”的君子之德的。就是说,说话要注意对象和场合。孔子《论语·季氏》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经过反思,梁漱溟发现自己当年犯了“躁”而“瞽”的毛病。《论语·学而》讲“吾日三省吾身”,但是真正能做到的罕之又罕。梁漱溟是希望自己努力去做的,而且基本做到了,所以令人敬佩。

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在《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前言”中曾对知识分子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知识分子是一些从不满足事物的现状,从不求助于习惯和惯例的人。他们用更高的和更宽广的真实去衡量和质问此刻的和暂时的真实,他们诉诸‘非实用的’,但又是‘应当的’责任,去反抗急功近利的做法。他们把自己视为理性、平等和真理等抽象概念的特殊监管人,视为道德标准的警惕的卫士,而这些都是为市场和权力场所忽视的。”^②这里所凸现的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使命感。梁漱溟正是怀抱这样的使命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真正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使命。大儒梁漱溟因怀抱着知识分子的使命而思想,又因思想而在“权力”面前说“不”,这对于那些虽有知识分子之“名”不行知识分子之“分”,失落了独立性、自主性与反抗性的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当代官僚知识分子来说,是具有很深的警示意义的。

儒家的理想人格美形象是“君子”,而“君子”的人格美内涵,在笔者看来主要就体现在“浩然之气”、“勤于思”而“敏于行”以及“尽名分”和“反躬自省”等等方面。

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告诉我们,梁漱溟敢于在“权力”面前说“不”,对应的是儒家理想人格——“君子”的“浩然之气”;其本己思想而动,对应的是儒家理想人格——“君子”的“勤于思”而“敏于行”;其怀抱知识分子的使命,对应的是儒家理想人格——“君子”的“尽名分”与“反躬自省”。这样,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风范就在梁漱溟的思想和行动上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儒家所谓“君子”在梁漱溟身上得到了直观的观照。你若问什么是儒家的“君子”人格美,笔者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梁漱溟大儒便有;你若问什么是儒家“君子”形象,笔者同样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梁漱溟大儒便是。

梁漱溟身上的“君子”人格美内涵既如上述,那么,当我们看到头戴黑圆帽,身穿黑长袍,鼻梁黑眼镜,颌蓄白胡须,目光锐利,双唇紧闭,身材单瘦,脸庞清癯的老者形象,并自然而然联想起他因持守知识分子使命而思想,又因尊重自己思想而不断在“权力”面前说“不”的桩桩历史事件,一个充盈着“君子”人格美的鸿儒形象不就从书本里走了出来,变得生动、鲜活起来了吗?——他,就是现代儒家——“君子”梁漱溟。

(作者通讯地址:李启军 南宁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530007)

(责任编辑 晓 思)

① 伍永忠:《儒家“君子”人格的美学内涵与社会和谐》,《长沙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② 罗殿宏、吕剑平:《梁漱溟:为民请命一鸿儒》,《兰台世界》2006年第4期。